

臺灣外籍配偶結構性弱勢情境之分析

王明輝

中文摘要

近年來，臺灣跨國婚姻已呈現穩定的成長趨勢，國人與東南亞籍或大陸籍女子結婚的現象，日漸普及。然而，通常這類婚姻並不被看好，且被視為是臺灣社會問題的根源之一。本文主要目的，在於探討跨國婚姻形成的結構因素，分析何以這類婚姻被賦予負面評價，並探討其為弱勢群體的情境，以及其欲擺脫這種情境的可能性與限制。

關鍵詞：外籍新娘、弱勢群體、跨國婚姻、買賣婚姻

Abstract

Recently,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married to the brides from southeastern Asian or Mainland China has become a popular phenomenon in Taiwan. However, it seems to be looked down and to be thought as one of the root of the social problem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explore the structural reasons why the transnational marriage had happened and how people gave it a negative impression. Besides, this article will examine its minority situation and discuss the possibilities and limits of its future destiny.

Keywords: foreign bride, minority group, transnational marriage, commodity marriage

壹、前言

近年來，跨國婚姻現象已在臺灣社會快速的成長。根據統計每年大約有五萬個臺灣人，與東南亞國籍或中國大陸籍的人通婚，占臺灣總結婚對數超過 1/5 以上的比例（註 1）。在這些跨國婚姻中，又以娶女性外籍配偶為妻者，占絕大多數。如此快速成長的跨國婚姻，已變成臺灣社會中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預期對未來臺灣社

會將造成重大的影響。

外籍配偶進入臺灣社會後，由於她們是進入本土社會的新族群，又來自於經濟發展程度較臺灣落後地區，其臺灣配偶大都是社會的底層者，因此她們難免就成為本地社會的一個新的弱勢族群。故本文擬從弱勢團體的角度，首先分析臺灣跨國婚姻形成的結構性因素，然後探討外籍配偶在臺灣可能遭遇到的弱勢情境，最後再進

一步說明外籍配偶在臺灣的未來，以及若果擺脫這種弱勢情境的可能性與限制。

貳、跨國婚姻的結構性導因

臺灣外籍新娘現象是跨國婚姻的結果。但跨國婚姻的形成，則有其結構性的因素使然。跨國婚姻顧名思義，是不同國籍之國民間的通婚現象。此一現象隨著國際間人們的往來、互動，自然而然地伴隨出現，並非現今社會所獨有。然而，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發展，自 1970 年代以來，國際移民現象有日益興盛的傾向(王宏仁，2000)。不過，光從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角度，來理解臺灣近年來大量出現外籍配偶現象，還是不足夠的。因為臺灣加入世界經濟的潮流中，並非近幾年間的事，若單純只是受世界經濟全球化之影響，則此一現象早應已出現，不待此時。故其中還另有其他重要因素的作用，須加以考量。若從近幾年來臺灣所處的內外環境看來，導致大量外籍配偶現象發生的原因，可以區分為外部結構及內部結構兩大因素來分析。

一、外部結構因素

就外部結構因素而言，原本世界經濟全球化的範疇下，一般都只注意到國際間經貿往來互動的問題。這其中發展理論觀點已注意到，這種全球化的世界經濟體系，其實是受到經濟已高度發展的國家為核心，向外輻射地對其他國家行經濟統御的過程。由於世界經濟全球化有這層經濟統御的關係，所以核心與邊陲國家的經貿關係，並不是一種平等的交換關係，實際上是一種經濟控制，甚至剝削的關係。過

去，對此一世界經濟體系的批判觀點，大都著眼於經濟與政治面的宰制問題；然而，當剖析跨國婚姻的內涵與過程時，同樣發現這種宰制的關係也存於其中。

以近年來臺灣每年大約有兩萬人與東南亞女子結婚為例，很明顯地可以印證前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作用，也已擴展到社會面向。根據學者觀察指出，東南亞外籍配始於八〇年代臺灣實施「南向政策」的結果(王宏仁，2001)。不過，這樣的陳述僅止於現象的表面描述，並沒有道出其中的關鍵機制。因為縱有「南向政策」，可能有為數不少的臺商赴東南亞投資，但這並不必然帶來臺灣與東南亞國家跨國聯姻的熱潮。事實上，目前臺灣與東南亞國家間的跨國婚姻，絕大多數的臺灣男子，並非至東南亞投資的商人或臺籍幹部，這表示如果「南向政策」與東南亞國家的跨國婚姻有關，其關聯性並非如此單純、直接。比較適切的說法，應該如夏曉鵬所研究指出，跨國婚姻的現象必須擺在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商品化經濟的角度來考量。依照夏曉鵬(2002: 163)的說法，「『外籍新娘』現象，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兩地，被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排擠至邊緣地位的男女勞動者，為求延續生存而形成的結合。然而，邊緣者的這種結合，並不必然等於結盟，亦不能浪漫化為『地球村』理想的在地化體現。因為，『婚姻移民』現象不僅為資本主義發展下的產品，更將抽象的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具體化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社會關係。這種不平等的社會關係甚至是表現在日常生活中：婚姻關係中所產生各種細微差異及衝突，往往被核心國家的成員詮釋為邊陲國家不發達的因素，亦即將

歷史的、動態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異化為不可逆轉的必然結果；此種異化更進一步地強化資本主義的發展」。

易言之，臺灣現階段大量跨國婚姻所產生的「外籍新娘」，與其他開發國家流行的「郵購新娘」，本質上都是「商品化的跨國婚姻」。這種「商品化的跨國婚姻」，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商品化的延伸，或者為其「副產品」。因此，原本單純的婚姻關係，也同樣地隱含了資本主義全球化不平等的經濟關係，形成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社會關係」。

臺灣跨國婚姻中，除了上述東南亞國家的女子外，中國大陸籍的女性配偶數量其實更多。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以民國 91 年為例，當年大陸配偶有 29,235 人，同年的外籍配偶為 20,107 人（註 2）。事實上，目前國內每年大約有五萬對的跨國婚姻，中國大陸籍配偶約三萬人，東南亞籍約兩萬人。然而，臺灣地區居民與大陸籍女子結婚的情況，與上述的跨國婚姻稍有不同。基本上上述之「商品化的跨國婚姻」情況，也可以解釋部分與中國大陸間的婚姻現象，但其情況還更多元化。因為從跨國婚姻的形成過程而言，兩岸間的婚姻主要經由親友介紹、兩岸經貿往來、海外認識，及婚姻仲介等方式形成（王春益，1998；陳小紅，1999；陳淑芬，2003；江亮演等，2004）。這些不同管道所形成的婚姻，其所代表的內涵可能也有不同。理論上，若是透過婚姻仲介管道形成婚配者，與前述東南亞籍婚配的情況較相近。但若是因兩岸經貿往來所形成的婚配，則可能有很多是臺商或臺籍幹部，赴大陸投資或工作的過程中，在大陸當地與其配偶

認識後再結婚。屬於這類型婚姻的臺灣男子，可能其社會經濟地位不見得會比較低，而且很多由於事業經營及工作的關係，也不見得婚後一定在臺定居，而是留在大陸長期居住。由此可見，臺灣跨國婚姻的形成，從外部結構言之，一方面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商品經濟的影響，另一方面兩岸經貿密切往來的結果，也是一項重要的導因。

二、內部結構因素

資本主義全球化所造成的效應是全面性的，全球各地幾乎都很難逃脫其牽連。但臺灣被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商品經濟的體系中，則非近幾年內才發生的事。因此，從時序上言，跨國婚姻出現於臺灣社會的盛況，非僅是臺灣被納入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之外部因素可以解釋，其中還有與臺灣社會內部環境有關的因素，也應該被釐清。

關於臺灣社會內部是何因素，造成跨國婚姻推波助瀾的效應，可以從跨國婚姻的特徵中找解答。首先，就目前臺灣發生跨國婚姻的區位分佈來看，發現都市化程度愈低的地區，跨國婚姻的比例愈高，這表示跨國婚姻主要是發生在臺灣的農（漁）村地區。但何以是在農（漁）村地區？若進一步探討這些跨國婚姻的本地配偶身分時，則可發現這些人往往是教育程度較低、所得收入也偏低，農工行業或榮民身分者居多，有部分甚至是身心障礙者等人。筆者曾對澎湖地區之大陸籍本地配偶進行婚姻狀況調查，結果也發現，他們當中約有 70% 教育程度在國中以下，農（漁）、工行業別也占約 70%，月均收入低

於 15,000 元者，竟達三成以上（王明輝，2004）。由此可見，發生跨國婚姻者，其實都是本地社會一些底層者居多。他們一方面是社會中競爭力較弱者，同時也是婚姻市場中的失敗者，在本地婚姻市場中，找不到婚配的對象下，才尋求跨國婚姻，以完成其終身大事。

此外，從以上本地配偶的身分特徵身上，可以發現幾點與臺灣本身社會內部有關的結構性因素，是造成近幾年來跨國婚姻急遽成長的重要導因。例如在婚姻市場中，臺灣的性比例長期處於的失衡狀態中。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自民國 65 年以來，臺灣全國的性比例雖已逐年下降，但仍維持在 104 以上的水準（註 3），這表示臺灣男性人口遠多於女性人口。事實上，如果再更進一步瞭解近幾年出生嬰兒的性比例，會有一令人更為驚訝的發現，即原本看似性比例已逐漸衡穩的現象，可能未來會再急遽上升。因為從附表 2 的統計資料來看，從 87 年至 92 年的新生嬰兒性比例，竟然又回升到 108 以上的水準，而且還有繼續上升的趨勢。此一現象對臺灣社會的影響至為重大，政府有關單位及學界應予以重視。然就本文關懷的主題而言，此乃代表臺灣婚姻市場處於失衡的狀態中，「婚姻排擠」（marriage squeeze）效應嚴重，才會導致臺灣婚姻市場中，男性人口的未婚率一直遠高於女性的原因（註 4）。而且，更令人擔憂的是，這種情況未來還會更加的嚴重。

然而，純粹從「婚姻排擠」的效應，解釋跨國婚姻的現象，還是有不足的地方。因為臺灣男性人口因性比例過高，導致失婚嚴重的情況，早在跨國婚姻大量形

成之前即已存在。這表示國內婚姻市場除有的「婚姻排擠」效應外，也存在所謂「婚姻坡度」（註 5）（marriage gradient）的問題。而近幾年來，臺灣社會開放，女性意識抬頭，以及女性社會經濟權力的提升下，使得婚姻坡度的效應更加明顯。在這雙重的婚姻效應下，國內男性的未婚率才會一直居高不下；但女性在婚姻坡度的作用下，同樣還是維持一定未婚率的現象。就因在這樣的內部環境下，跨國婚姻的婚配方式，成為填補臺灣大量被擠出婚姻市場男性的婚配選擇。

從以上這些人口及婚姻的統計中可發現，在結構上已有為數不少的臺灣男性，註定要成為婚姻市場中的失婚者。然而，這些人會是誰？其實，答案已經很清楚了。他們當然大部分是屬臺灣社會的底層位置者。身居底層位置者，在婚姻市場中，一樣是較不具競爭力的一群，於是他們先是在婚姻排擠效應下，被擠出了婚姻市場；再加上女性意識的日益崛起，擴大了婚姻坡度的效應，使得更多女性寧願選擇單身，也不願「下嫁」認為條件比她差的男性，如此更會加遽婚姻排擠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這些被婚姻市場排擠出的男子，若是他們仍然要尋找婚配的對象，則跨國婚姻當然只能是他們可以選擇的唯一途徑。因為他們在臺灣的婚姻市場中，是被排擠出的對象；但在跨國婚姻的市場中，則是一個「優勢位置」者。他們可能從跨國婚姻中找到了主動權，也相對的找回了作為男人的「自尊」，這可能是他們身處臺灣社會底層階級，從來沒有經驗過的優越感，卻可能在跨國婚姻的過程中實現了。然而，對於這些低階層加入跨國婚姻

行列者而言，這種從未嚐過的優越者角色經驗，可能僅止於在尋找跨國婚姻的短暫過程而已。因為當跨國婚姻組成之後，他們回到現實面時，面對的又是社會對他們這種跨國婚姻的負面標籤，使得他們又再度陷入過去人們對其的鄙視生活情境中。這種生活體認的轉折，對跨國婚姻組成者的衝擊，其作用與影響可能也是非常深遠的。

參、跨國婚姻的負面社會認知

整體而言，目前在臺出現的跨國婚姻，一般人幾乎都是持著負面的社會認知，並認為其將衍生出諸多社會問題（江亮演等，2004；戴鎮州，2004）。而此一負面社會認知，又可以從底下兩個層面來加以理解：

一、扭曲的婚姻價值與不平等的婚配關係

如前述，這種跨國婚姻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驅使下，第三世界的女性被同商品般的輸出到核心或半邊陲國家，婚姻只不過是這種交易的包裝罷了。於是般以為這種婚配的方式，無疑是一種「買賣」，此與現下社會主流的婚姻觀，如強調「浪漫愛」式的、情感豐富式的愛情婚姻，當然是大相逕庭的；對強調女性主義者而言，這種婚姻更是難以容忍的事。因此，在這種被扭曲的婚姻價值下，這些女子在臺灣的夫家，往往不是被歧視為傳宗接代的生育機器，就是被視為合法的外籍廉價或免費勞工般對待（夏曉鵬，2002；江亮演等，2004）。

另外，在傳統的中國婚姻嫁娶關係

中，其實本已潛藏著一種不平等的性別關係。古人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或云：「夫唱婦隨」，其內涵充滿了父權主義的思想。一般認為，這種思想普遍地仍然存在現今臺灣社會中，男性往往佔有主導性地位，而女性只屈居附屬或從屬地位（戴鎮州，2004）。如今，跨國婚姻又多了一層買賣關係，更深化了這種婚姻的父權性格與其間的權力不平等關係，使得夫家更不尊重這些外籍配偶，並且很功利地計算是否娶到一個划算的媳婦（江亮演等，2004）。

由此可見，跨國婚姻一方面違背現下主流的婚姻價值，受到嚴厲的譴責；但另一方面，因前述的結構性導因，跨國婚姻又有無法遏抑的趨勢。這樣的結果所造成的效應是，嚴厲的譴責形成跨國婚姻者，無比的沉重負擔與自貶，使得他們對外，可能難以正常的面對外界社會；但對內，卻也因受到外界負面的標籤，以及傳統婚姻觀念的影響，而鄙視自己的配偶與婚姻。因此，吾人對跨國婚姻提出批判時，其實應該更加地慎言，因為它在無形中，可能又造成了另一種負面的效應。

二、問題婚姻導致社會問題

由於跨國婚姻乃受外力扭曲形成，導致婚姻價值被扭曲，兩性間的權力關係嚴重失衡，故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問題婚姻」的組合。這種「問題婚姻」因其本質上的缺陷，故又被認為有可能導致各種社會問題來。首先，在生活適應方面，由於文化上的差異，經常導致外籍配偶發生飲食習慣、文字語言溝通、不了解風俗民情、婆媳關係緊張、婚姻暴力、子女養育與教育、

社會關係疏離等問題（陳庭芸，2002；戴鎮州，2004；朱玉玲，2002；劉美芳等，2001；謝臥龍，2002；潘淑滿，2002；林秀美，2003；周美珍，2001；李玉梅，2003）。其次，由於這些來自第三世界跨國婚姻的女子，教育程度大都低於本地女子（郭靜晃、薛慧平，2004），而本地跨國婚姻的男子，大都也是教育程度低、社經地位較差者，且臺灣配偶的年齡普遍又高於外來配偶的年齡，「老夫少妻」的情況十分普遍（王春益，1998；周美珍，2001；陳小紅，1999；王明輝，2004）。故導致其下一代的子女，因教養上的問題，而影響臺灣下一代的人口品質（鍾重發，2003；何青蓉，2003）。最後，跨國婚姻由於有以上諸多可能產生的問題，因而有很多婚姻不幸福者，乃有逃家的現象。一旦逃家之後，則有可能從事非法打工或賣淫，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江亮演等，2004）。此外，根據警政單位的統計發現，跨國婚姻中有許多是所謂「假結婚」的現象，其目的或為賣淫，或為非法打工而來（張增樑，2002）。而這種假結婚的現象，將造成臺灣有影響國家安全、危害社會治安，及個人損失與社會負擔等嚴重的社會問題（江亮演等，2004）。

簡言之，跨國婚姻可說是受到國際資本主義及本國社會階層化雙重扭曲下，所造成的婚姻。這種婚姻的品質被視為是充滿問題的「問題婚姻」。這種婚姻往往不會有好的結果，也會導致嚴重的社會問題。這大概是目前一般社會普遍認知，也經常是學界主要探討的焦點所在。

肆、外籍配偶的弱勢情境

從上述跨國婚姻形成的結構性導因，

以及社會對其負面認知的探討下，隱約已可見跨國婚姻者的弱勢處境。接下來，在本節將再進一步地探討其所處的弱勢困境為何。在未直接討論外籍新娘的弱勢問題前，有必要先釐清弱勢團體的概念，然後才能進一步定位外籍新娘的弱勢境遇。經濟學者吳忠吉（2000：64-65）認為：「在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制度下，少數族群或低所得者，無力導引政策走向與競爭經濟資源，形成政治與經濟的弱勢族群。同時，因文化差異，亦有少數族群，受到社會的歧視與不公平的對待」。由上述可知，在民主社會裡所出現的弱勢團體，有政治性、經濟性與社會性的三種可能類型。當然，作為社會裡的弱勢團體，其弱勢處境往往不會只是局部的，而會相互影響，例如在經濟上處弱勢者，可能連帶也造成其政治性與社會性的弱勢，導致社會中的弱勢者，總是各方面都居於劣勢的結果。至於，是何因素造成某些團體變成弱勢者，一般大略可分為內在與外在兩種不同的歸因。內在歸因者將導致弱勢的結果，歸因於當事人本身的因素，外在歸因者則認為是受外在結構、環境或非當事人所能控制的因素使然。但一般會採何種歸因方式，則牽涉到個人的心理態度。通常同情當事者的，會傾向外在歸因；反之，採內在或個人歸因解釋的，通常較不同情困境的當事人（傅仰止，2001：67）。

但不管弱勢者是基於那種因素使然，在民主社會裡，基於實踐社會正義與人權需求的理想，故通常有一股正當性的力量，會驅使政府，給予相當的優惠措施，以彌補其弱勢的劣勢處境。然而，也有可能有些人會基於不同因素的考量，反對給

予這些弱勢者優惠措施。因此，社會裡的弱勢者不必然即可得到優惠救濟，某一弱勢群體是否可以得到政府的優惠措施，可能涉及相當複雜的社會因素與歷史過程，必須達到政府認定其具有足夠的「正當性弱勢」情況下，才會給予優惠政策。以臺灣原住民族群為例，目前所擁有的各項優惠措施，範圍廣及參政、教育、居住、就業、就醫等層面，實際上也是經過長期的過程下形成的(王甫昌，2001：57；1998：34-36)。至於外籍新娘的情況「正當性弱勢」如何？則也是應予探討的重點。

基於上述的討論，底下擬從結構性的條件，即分別從政治性、經濟性及社會性的角度，討論外籍新娘的弱勢成因；另外，再從「正當性的弱勢」角度，探討外籍新娘作為一個弱勢團體的性質。

一、外籍新娘弱勢的結構性條件

(一)政治性弱勢

所謂弱勢團體的政治性弱勢，如前述乃其「無力導引政策走向」，導致政策不利該群體的利益取得或資源的分配。但「無力導引政策走向」是一連串社會過程的結果，故在此有必要對這一連串的社會過程做剖析，方能認清其政治性弱勢的處境。而由於社會過程到政策走向，已涉及政治權力的占有與分配的問題，此問題在民主政治中有很多不同立場的論述，但總括可以從功能論與衝突論來加以區分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傾向功能論者將政府視為是社會各種團體與勢力的代表與仲裁者，社會政策的制定，乃以維護社會大多數人福祉為原則，社會政策走向會以大多數的民意為依歸。傾向衝突論者則認為，政府只

是既得利益者的代表或同路人，社會政策的制定，主要是為確保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政策走向則受既得利益階級所支配。

於是從前者的觀點解釋弱勢團體的存在時，則認為弱勢團體是社會中競爭力較差或者代表少數利益的一群，以至他們無法主導政策的走向，並為政府所忽視的結果。至於其何以會競爭力不足，則又認為是此團體成員的努力不夠或體質較差使然，若其能力圖振作，社會其實也提供通暢管道，使其能有擺脫弱勢處境的機會。因此，此種觀點往往視弱勢團體是咎由自取，未必會給與同情與扶持，惟社會公平正義的觀念也是民主社會中的重要價值，故政府社會資源的分配角色，仍會多少給予社會福利方面的救助與救濟，但此種救助與救濟可能是消極的，卻非政府政策的主要考量。

而後者對社會中存有弱勢團體的看法，則與前者觀點完全不同。他們認為弱勢團體表面上在社會各團體中的競爭力不足，實際上並非該團體本身的能力不夠，而是政府原本所提供的競爭條件本來就不利於這些團體。因此，弱勢者弱勢的處境，主要是社會結構的安排所形成的結果，就算是這些弱勢者再怎麼努力，永遠也不可能擺脫弱勢的情境，除非結構條件必須先有改變。但結構條件又因受既得利益者所掌控，弱勢者幾乎無法從既有體制中改變弱勢的狀態，最後唯有採取反體制的社會運動為手段，方能改變這種狀況。

從以上簡單論述弱勢團體的政治性弱勢意義後，讓我們再把焦點擺回外籍新娘的身上。首先，我們必須瞭解到，既然這裡的弱勢為政治性，則最基本的已預設弱

勢者本是與其他非弱者者一樣，同為此社會中的一份子，只不過是其無力導引政策走向，以維護自己的利益罷了。但對外籍新娘而言，她們可能連這一個最基本的條件都沒有。這是因為這些外籍新娘，並非一與本國籍男子結婚，即可成為本國的公民。依我國法律規定，她們必須要經過一段時間，在臺灣申請停留、居留、定居，而後才能取得戶籍，再申請歸化，成為我國的公民。這個過程一般的外籍新娘須三年時間，大陸新娘更須達八年的時間（註6），若再加上每年所能核准居留的數額計算時，她們取得公民的身分時間還要更長（註7）。亦即，外籍新娘在臺灣居住的前一段時間，她們是不具備本國國籍身分的。無本國國籍身分，當然就不能享有本國一般國民同等的權利，甚至還可以進行某些生活上的限制。因此，就這個角度而言，她們可能被認為連稱得上弱勢的「資格」都沒有（註8），因為她們的身分還是外國人。然而，這些已是臺灣媳婦的「外國人」，雖已生活在臺灣社會，卻必須要面對體制上必然的差別待遇，這種弱勢情境恐怕比政治性的弱勢更嚴重。政府相關部門對於這種差別待遇，並不諱言對其具有歧視性，甚至舉憲法增修條文為依據，認為如此作法有其法律基礎（註9）。

由於外籍新娘無本國國民身分，故無法以弱勢國民的立場，爭取政治上的權益。但即使如此，國家對於這類「準國民」身分者，抱持何種對待態度，及提供何種照顧措施與限制條件，仍與政策之制定有關，從這些政策的內容，多少也可評估其在政治上的弱勢程度。若就外籍新娘在未取得國民身分前之相關權益而言，主要不

外乎身分取得、就業機會及相關的福利、輔導與救助措施。有關身分取得的部分，根據我國《國籍法》第四條規定：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每年合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繼續三年以上者，得申請歸化。但依據《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十七條規定，臺灣地區人民之大陸配偶，須結婚已滿二年或已生產子女者，才得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可見，我國對於外籍新娘取得國民身分的限制並不短，而對大陸新娘的限制更是嚴格。至於，這樣的身分取得時間，到底是否過於嚴苛，恐怕不能與他國相較做定論，因為各國可能基於不同的考量，也有不同的時限。但我國的考量，則應該加以探究是否何宜。以目前規範外籍新娘相關的法令看來，實際上政府是充滿了反制的心態，此因外籍新娘主要來自比臺灣經濟還落後的東南亞及大陸地區，政府單位或許基於人口素質、就業機會、犯罪，乃至於意識形態的考量下，試圖從身分取得時間及配額措施，以反制外籍新娘大量湧入的現象。當然，政府這種反制的立場，雖有其社會整體利益的考量，但卻也變成無法給予外籍新娘較大權益與便利的結果。

至於在工作機會與相關福利、輔導與救助措施方面，目前政府已同意大陸新娘在臺的工作權，但詳細辦法仍未定訂。相關的福利、輔導與救助措施則是付之闕如，無法給予一套標準與妥善照顧的做法。目前外籍新娘所得到的輔導與照顧，大概全憑地方政府是否重視，願意投入多少人力與經費以照顧之；但基層是否有足夠的人力、專業及經費，以輔導協助外籍

新娘，則又是另外一個問題。此外，目前的部分民間團體也注意到外籍新娘處境的問題，並且主動的介入，扮演協助者或為其發聲的角色；然而，畢竟民間團體的資源有限，也很難未外籍新娘提供全面性的照料。綜而言之，如何照顧外籍新娘的問題，在政府及民間部門應已有普遍的共識，但政府部門卻尚未建立一套完整的輔導及照顧體系，民間部門也只能扮演局部個案的處理事件。故如何妥善處理外籍新娘的問題，仍待政府提出進一步具體措施，但在研提處理措施之前，瞭解外籍新娘的處境、需求與感受等等課題的探討，則是目前刻不容緩的工作。

(二)經濟性弱勢

如前所述，弱勢團體在經濟方面的弱勢，乃因在市場經濟制度下，低所得者無力競爭經濟資源的結果。雖然在民主制度下的自由經濟市場，通常具有一定的公平性，提供作為自由競爭的基礎，但進入市場競爭者，則因個人的條件不同，而會影響其競爭力。因此原為經濟上弱勢者，面對自由競爭市場，往往難以成為優勢者，結果便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弱者愈弱，強者愈強，這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經常為人所詬病之處。

就外籍新娘所處的經濟性的弱勢，其實是顯而易見的，因為她們原本就是經濟匱乏者，才會嫁至臺灣來。故而，探討其經濟性的弱勢，應將焦點擺在其所嫁之對象的經濟條件與能力方面。亦即，若外籍新娘所嫁之臺灣新郎，其家境是富裕者，或其本身的經濟競爭能力強者，則因其所依託之對象為自由經濟市場中的強勢者，其經濟生活也會隨之變得較佳；但反之，

亦然。由此可見，其經濟上是否為弱勢，必須視其所嫁的對象而定。事實上，從前述法令上的規定，外籍新娘的工作權受到相當嚴格的限制，因此即使外籍新娘本身有經濟上的能力，也因受制於法規，而無用武之地（註 10）。

既然外籍新娘是否為經濟上之弱勢者須視其婚姻對象而定，則目前臺灣娶外籍新娘的男子家境如何？很顯然地，從目前的報導與研究發現，大部分娶東南亞新娘或大陸新娘者，尤其是透過婚姻仲介者媒介結婚者，普遍不外乎是在本地婚姻市場找不到對象者、身心障礙者、年紀老邁者、低收入者等類人（註 11）。由此可見，外籍新娘在臺結婚的對象，大都還是這個社會的經濟弱勢者，理所當然的使得她們跟著也變成經濟上的弱勢。有時，甚且還要再去照顧其所下嫁的弱勢家庭，其經濟性的弱勢更是悲慘。

(三)社會性弱勢

所謂社會性弱勢是指少數族群因文化差異，受到社會的歧視與不公平的對待。人類學家把歧視現象看成是各種群體間「對話」的一種形式，通常只要有個體擺脫社區的範疇，就或多或少感覺到歧視的存在（蕭亮中，2002）。因此，歧視的問題可能是任何社會的普遍現象。而且，社會群體間的歧視現象龐雜多樣，但大多仍是在族群、地域、性別、職業等方面外現。尤其不可忽視的是，當歧視作為各種群體之間的一種「對話」時，它會變成群體的意向，「並通過各種話語，從個體到個體輪達以至形成一股不可逆的輿論。這種輿論性的話語往往是群體根深蒂固的看法，任何的行政措施都不可能輕易改變其強識的

不可逆性，單薄的反向語話也無法阻擋其流向。對他群體抱有歧視意向的群體往往會有意無意控制這種輿論，也就是掌握了歧視話語，在互相對話中擁有了『歧視權』」（蕭亮中，2002：137）。可見，歧視所造成的社會性弱勢現象，不只是人們短暫的社會反應而已，而是一種潛存於族群間的社會心態。此種心態可能內化於群體成員中，非透過深刻的反省，是無法察覺的。即使察覺到這種歧視性的問題，想要透過行政手段予以導正，有時也未必可以達成。在民主社會中，追求公平正義、化解弱勢者困境，乃其重要的價值之一，故如何發掘社會性弱勢情境，進而導引群體意向，降低族群間的強弱關係，是當代社會的重要課題。

那麼外籍新娘在臺灣的社會性弱勢處境為何？她們受到本土社會族群什麼樣的意向對待？其中的歧視程度又若何？很明顯地，外籍新娘在臺的社會性弱勢，其實是背負著國與國或族群間歧視意向的「原罪」。另外，又再加上前述資本主義商業化的操弄下，使地位被貶至最低。因此，這裡所稱的「外籍」新娘，並非泛指所有非我國籍的新娘，而是指東南亞國籍與大陸新娘而言，其他國籍的新娘，可能看不到這種歧視的現象。此即證明，我們對於來自東南亞及大陸的新娘印象，正是用我們對於這個國家的看法，來理解與定位她們的特質。而我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些國家？對東南亞國家而言，長期以來或許也是我們受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影響，認為自己是開發中國家，歐、美及東洋日本是先進國家，東南亞及大陸地區是未開發或低度發展國家。經濟上國家定位分類，也連

帶影響了對於這個國家全貌的所有判斷。以至於經濟先進國家，其他一切部門也是先進的；經濟未開發國家，其他各方面則都是落後的。既然這些外籍新娘是來自落後地區，因此一般對她們的印象就不會是太正面的。夏曉鵬（2001）在《「外籍新娘」現象之媒體建構》一文中，從建構與詮釋的敘事分析角度，探究國內媒體將外籍新娘的種種負面建構，並將其視為一種「社會問題」，其實乃根源於這些媒體對於東南亞女性的歧視，而此一歧視態度，其實正是普存於臺灣社會中對於「第三世界」貶抑的價值觀。由此可知，外籍新娘的弱勢性質除包含了國人在父權社會、國籍、性別及階級等多重歧視外，還有商品化、在地殖民化、族群性等問題，如此使其弱勢情境，更加嚴重、更無法擺脫。

伍、外籍配偶弱勢困境與未來

由以上的論述可知，外籍新娘在臺的處境極為惡劣，短期間內根本看不出也談不上有翻轉處境的可能性，但是否因居極度的弱勢，即可取得政府社會憐憫或特別照顧，進而受到特別的照顧或政策優惠？此一課題並非想像中單純，值得先論述一番。理論上而言，一般同意弱勢者應該會受到社會的憐憫及政策的優惠，因為大家相信這為普世的價值。民主政治中，雖強調資源分配以市場自由競爭為法則，但也認同政府對於弱勢者有給予特別照顧的職責。然而，實際上並非所有社會中的弱勢者，都可以得到政府的特別照顧，那麼其間的差別何在？在此，筆者擬以「正當性的弱勢」的概念，來檢討其中的差異與內涵。所謂「正當性的弱勢」者，乃指那些

被視為弱勢的，且最後還得到政府的優惠照顧者。這裡對弱勢者冠上「正當性」的形容詞，主要是因為優惠政策來自於政府，能夠取得政府的優惠政策者，表示其弱勢受到政府的認可，故「正當性」是政府來認定的，非社會一般的標準。於是，從這樣的界定下，弱勢者可分成兩類，一為具「正當性」者，另一類則無。但為何並非所有社會弱勢者都可取得「正當性」，只能有部分弱勢者得到政府的優惠政策？顯然其中還有複雜的因素與過程，須再進一步的釐清。

首先，由於政府操控制度性的公共資源，而且只有政府有權力分配這些資源，但政府決定資源分配本身是一個決策的過程。既然是決策的過程，則影響這個決策過程的因素，就變成某些弱勢團體是否具有「正當性」的關鍵。然而，哪些因素是會影響決策的過程？筆者認為此一課題值得做深入的探討，因為政府資源分配的過程，其背後有可能是各種權力的角力結果，故從目前政府給予哪些弱勢團體優惠政策，哪些卻沒有得到的結果，反追其過程，必然可使這些權力角力過程現形，同時藉由此一過程的追溯，還可以瞭解政府對所有弱勢團體的看法與定位。

其次，從弱勢團體是否取得「正當性」的結果，也可以進一步分析其間差異的意義何在。很明顯地，社會中被視為弱勢團體者，可能有很多，但可以取得「正當性」的，也許只有一部分，於是可能會發生底下幾種情況：有些被普遍認為是弱勢者，但得不到弱勢者的「正當性」；有些或許並不被視為是弱勢者，卻擁有政策優惠；或者政府「正當性」的給予，剛好也符合社

會的期待。以上的各種情況，都各有其社會內涵，值得進行深入探究。

另外，若就某一弱勢團體取得「正當性」的過程，作為一個研究對象時，或許將會發現此一過程充滿了可供討論的議題。例如在何種情況下，哪些人可以稱得上是弱勢團體？哪些弱勢團體會得到社會的同情？哪些弱勢團體比較會受到政府的重視？弱勢團體想要取得「正當性」時，是否要採取某些策略？是否需要外力的協助？以上這些課題有些可能已超越弱勢團體的概念範疇，而必須從整體社會的角度考量之，可見此一課題的內涵十分豐富。

透過上述對於「正當性弱勢」概念的釐清後，讓我們再把焦點放在外籍新娘的現象上。首先，外籍新娘目前是不具「正當性」的弱勢者，因為很明顯地，目前並沒有任何的政策性優惠，是針對此類人而設計的。其次，外籍新娘作為一個弱勢團體，是否已受到社會的普遍認同？此一課題也許還必須做深入的探討，因為前述隱然也發現，社會各界對外籍新娘存有「污名化」的印象，但也有不少人對其抱持同情的態度，但到底普遍的感受情況為何，值得進一步瞭解。由於外籍新娘若要取得弱勢「正當性」，取得社會某種程度的普遍同情，也許是第一個先決條件。此外，外籍新娘還採取那些策略、爭取哪些外力的支持，甚至自己本身應如何組織與動員，才更能夠得到「正當性」，恐怕也都是弱勢者居「絕對性」的弱勢情境外，更必須去突顯其「相對性」弱勢地位的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以目前的社會條件看來，跨國婚姻的問題已逐漸受到重視與討論，政府部門也

開始研擬如何處置之道（註 12）。這樣的態勢，對跨國婚姻者而言，當然是個佳音，因為此對其爭取正當性弱勢地位是有助益的。然而，僅有這些措施，對改善跨國婚姻者的弱勢情境，仍是杯水車薪。因為從跨國婚姻的導因、負面認知，以及弱勢情境等面向看來，跨國婚姻者的弱勢，最嚴重的地方，也是最難解之處，就在於前述這些結構性因素上。更令人擔憂的是，在資本主義日益深化的臺灣社會中，社會階層化的差距會更加的拉大，這將導致一種

惡性的循環，使得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跨國婚姻者面對此一社會發展，其弱勢處境可能不只是他們這一代的問題而已，恐怕連其後代子孫，也將淪為更為弱勢的處境。為避免這樣的情況繼續惡化下去，治本之道，應在於如何減緩及縮短臺灣社會的階層化，並且伸張社會的公平正義價值。唯有如此，跨國婚姻的現象才有可能根本擺脫弱勢的困境。

（本文作者為國立澎湖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註釋：

註 1：資料來源：內政部網站 <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檢索日期 2004/5/1。

註 2：資料來源同前註。檢索日期 2004/5/1。

註 3：有關臺灣人口性比例的統計，如下附表 1 及附表 2：

附表 1 臺灣近年來性比例統計表

年度 項目	全國性比例	15 歲以上性比例	15 歲以上男多於女人口數
65	109.8	112.0	612,067
70	108.8	110.0	590,964
75	107.7	108.3	550,364
80	106.8	106.8	496,597
85	105.8	105.1	413,416
90	104.3	103.2	281,288

資料來源：取自內政部網站 <http://www.moi.gov.tw/stat/> 資料，整理所得。檢索日期 2004/7/3。

附表 2 臺灣近年來嬰兒性比例統計表

年度	87	88	89	90	91	92
性比例	108.7	109.5	109.4	108.7	109.8	110.2

資料來源：同附表 1。

註 4：根據內政部統計資料顯示，臺灣十五歲以上人口未婚比率如附表 3：

附表 3 臺灣近年來十五歲以上人口未婚比率統計表 (%)

年度		65	70	75	80	85	90	91	92
未婚率	男	42.48	40.62	39.04	37.98	38.27	37.41	37.19	37.16
	女	31.24	30.43	29.74	29.58	29.95	30.38	30.42	30.64

資料來源：同附表 1。

註 5：「婚姻排擠」(marriage squeeze)係指男女適婚人口比率不平衡時，其中男性或女性將被「擠出」婚姻「市場」的情況。「婚姻坡度」(marriage gradient)係指傳統上，女性有選擇比她年齡較長，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男性為結婚對象的傾向。所以，年齡較高或社會地位較高的女性們，她們的擇偶機會也相形之下受到限制。詳見藍采風，1996，頁 81。

註 6：詳見《中國時報》2002 年 10 月 31 日，2 版。

註 7：據報導，臺灣已有五萬九千一百八十五名大陸新娘申請在臺居留，取得資格者僅一萬六千六百二十人，還有四萬多人在等待，如果按照政府規定每年三千六百人的名額，要等十二年才能取得中華民國居留權。詳見大紀元 (2002a)。

註 8：事實上，臺灣社會確實有人持這種態度，認為大新娘尚未取得臺灣身分，不是臺灣國民，因此沒有集會、遊行之權利。例如當她們上街頭抗議、遊行時，高呼「蔡英文下臺」，卻被視為是「嚴重干預臺灣的民主和政治」。詳見臺灣新聞報 (2002)、陳錫蕃等 (2002)。

註 9：陸委會主委蔡英文認為，現行兩岸關係條例對大陸人民的在臺權益確有差別待遇，但這是憲法增修條文授權法律所訂定的特殊安排，即使被外界批評為歧視性條款，但其合憲性是沒有疑義的。詳見大紀元 (2002b)。

註 10：根據報導，某一大陸新娘於民國 80 年嫁到臺灣，於 87 年拿到身分證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報考公務人員初等考試，考取了公務員，並且分發到臺北市社子國小任職，但不久臺北市政府人事處即通知她因違反兩岸人民條例規定，要她一個月內離職。詳見大紀元 (2002c)。

註 11：如據報載，每五對兩岸婚姻中，就有一對是 60 歲以上臺灣老先生娶大陸新娘。詳見《聯合報》，2002 年 11 月 1 日。

註 12：例如政府為避免社經地位較低的外籍 (含大陸) 新娘家庭子女成為社會負擔，教育部通令各縣市教育局，93 年 9 月起，外籍新娘子女優先進入公立幼稚園。教育部也將辦理全國中小學教師研習會，讓他們瞭解外籍新娘較多的大陸、印尼及越南等國家文化，以便教導外籍新娘子弟時「對症下藥」，避免歧視。詳見《中國時報》，2004 年 7 月 10 日。

參考文獻：

- 王宏仁（2000）族群認同與國際移民趨勢。科學月刊 371：938～943。（2001）社會階層化下的婚姻移民與國內勞動市場：以越南新娘為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41：90～127。
- 王甫昌（2002）族群意識的地區差異。臺灣社會學 4：11～74。（1998）光復後臺灣族群意識的形成。歷史月刊 12：30～40。
- 王明輝（2004）親密愛人是自己人還是外人？。宣讀於「跨界流離：全球化時代移民／工業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主辦，2004年6月18日至19日。
- 王春益（1998）兩岸人民通婚之調查研究。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文化教育組碩士論文。
- 中國時報（2002）反對一項明顯歧視大陸新娘人權的立法。10月31日，2版。
- 朱玉玲（2001）澎湖的外籍新娘。西瀛風物 8：60～75。
- 江亮演、陳燕禎、黃稚純（2004）大陸與外籍配偶生活適應之探討。社區發展季刊 105：66～89。
- 李玉梅（2003）婚報求助一成是外籍、大陸新娘。聯合報（2003/8/7）B2版。
- 吳忠吉（2000）弱勢團體的問題與對策。新世紀智庫論談 10：64～65。
- 林秀美（2003）外籍新娘適應不良影響下一代發育。民生報（2003/11/8）CR2版。
- 何青蓉（2003）跨國婚姻移民教育初探－從一些思考陷阱談起。成人教育 75：2～10。
- 周美珍（2001）新竹縣「外籍新娘」生育狀況探討。公共衛生 28(3)：255～265。
- 夏曉鵬（2002）流離尋岸－資本國際化下的「外籍新娘」現象。臺北：臺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陳小紅（1999）大陸配偶來臺生活狀況案例訪視。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
- 陳淑芬（2003）「大陸新娘」的擇偶、受虐與求助過程－兼論服務提供者對「大陸新娘」的假設及其對服務提供的影響。社區發展季刊 101：182～199。
- 陳庭芸（2002）澎湖地區國際婚姻調適之研究：以印尼與越南新娘為例之比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增樑（2002）兩岸人民「假＞結婚」問題之研究－以「假結婚、真賣淫」為中心。中央警察大學警學叢刊 33(1)：203～236。
- 郭靜晃、薛慧平（2004）外籍配偶母職角色轉換困境與需求之探析－以東南亞外籍女性配偶為例。社區發展季刊 105：116～132。
- 傅仰止（2001）臺灣原住民優惠政策的支持與抗拒：比較原漢立場。臺灣社會學刊 25：55～110。
- 潘淑滿（2003）外籍新娘、公民權與社會政策：婚姻暴力的福利概述（計畫編號：NSC91-2412-H-017-00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劉美芳、鍾信心、許敏桃（2001）臺灣外籍新娘之文化適應——護理專業的省思。護理雜誌 48(4)：85～89。

鍾重發（2003）支援協助涉入外籍新娘家庭子女學齡前之兒童發展。兒童福利 4：251～257。

謝臥龍（2002）國際婚姻中婚姻本質與性別權力關係的探討：以臺灣受暴外籍配偶及其配偶為例（計畫編號：NSC91-2412-H-017-00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蕭亮中（2002）歧視的形成與輿論話語的掌握。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69：137～140。

戴鎮州（2004）大陸與外籍配偶問題與可能出路：社會人文觀點省思。社區發展季刊 105：91～100。

藍采風（1996）婚姻與家庭。臺北：幼獅。

報紙及電子媒體

入出國及移民法。檢索日期：2003 年 8 月 3 日。取自網址：<http://law.moj.gov.tw/fl1.asp>

入出國及移民法施行細則。檢索日期：2003 年 8 月 3 日。取自網址：<http://law.moj.gov.tw/fl1.asp>

大紀元（2002a）十年熬身分 大陸新娘在臺二等公民。檢索日期：2003 年 6 月 5 日。取自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25/n152151.htm>。

（2002b）大陸新娘認為在臺權益有差別待遇。檢索日期：2003 年 8 月 5 日。取自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2/6/20/n197571.htm>。

（2002c）大陸新娘考上公務員 因兩岸人民條例被迫離職。檢索日期：2003 年 8 月 5 日。取自網址：<http://www.epochtimes.com/b5/2/10/11/n234709.htm>。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檢索日期：2003 年 8 月 3 日。取自網址：<http://law.moj.gov.tw/fl1.asp>

大陸地區人民在臺灣地區定居或居留許可辦法。檢索日期：2003 年 8 月 3 日。取自網址：<http://law.moj.gov.tw/fl1.asp>

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出生數按生母年齡及胎次。檢索日期：2003 年 9 月 20 日。取自網址：<http://www.moi.gov.tw/W3/stat/home.asp>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檢索日期：2003 年 8 月 3 日。取自網址：<http://law.moj.gov.tw/fl1.asp>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施行細則。檢索日期：2003 年 8 月 3 日。取自網址：<http://law.moj.gov.tw/fl1.asp>